

周恩来

政府工作报告

人民出版社

周 恩 来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目 录

一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1
二	关于社会主义建設.....	8
	关于教育改革問題.....	18
	关于向科学进军.....	23
三	关于人民生活.....	27
	关于劳动就業問題.....	32
	关于工資制度問題.....	33
	关于学徒制度問題.....	34
	关于人民的文化生活問題.....	35
四	关于国家基本制度.....	37
五	关于国内外团結.....	49

各位代表：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以来，已经整整一年了。这是伟大的转变的一年。在这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绩，使我們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們取得了許多宝贵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繼續发展更加有了保证。这一年，就是以这些伟大光辉的成就载入我国史册的一年。

关于一年来的政府工作，国务院决定由我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作报告。我的报告，是依据毛澤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針，来检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見。这个报告分为五个部分：（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建设；（3）关于人民生活；（4）关于国家基本制度；（5）关于国内外团结。

一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業在生产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業者的个体經濟已經变为集体經濟。七万户的私营工業企業已經变为公私合营企業，将近二百万户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經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資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領導，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沒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沒有發生混乱，社会生产沒有下降。恰恰相反，我們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1956年的自然灾害，不仅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灾荒，也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灾荒，被灾田地約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約七千万人。在全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农业就经历了这样严重灾情的考驗。在党和政府的積極領導和支持下，全国农民發揮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实现了增产的要求。195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約为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計劃最后一年的指标；粮食（不包括大豆）的产量为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計劃最后一年的指标。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于大家忙于組織合作社和积肥造肥以及兴修水利等基本建設，并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产粮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农村副業的發展一度受到影响。1956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灾最重，产量比1955年减少了。但是，在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除了灾情严重的地区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

上的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农户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对于灾区，政府去年用于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等项的支出和发放生产救灾贷款的款项共达八亿六千万万元，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向灾区调运的粮食，增加了七十亿斤，而农业合作社的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1956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建设和生产同时增长，生产资料的需要骤然增大，因而使各种器材，特别是建筑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应出现了紧张情况。可是，尽管如此，1956年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营业，也都得到了发展。这一年，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百一十七亿元，较1955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九十一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约百分之三十二。1956年，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零售总额达一百一十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零售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政府已经完成了给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对私方人员也作了大体安排。

人们知道；当小生产一旦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以后，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这样设想，在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中，如果政府对私营工商业不采取一视同仁、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针，或者私营工商业者不参加公私合营而拒绝改造的话，那么，二百多万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营业不仅不能得到发展，并且必然会处于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

而私营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从业人员就会遇到失业和转业的困难。这不仅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对工商业者更加不利。党和政府从开国以来，就把私营工商业放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之内，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营工商业者就在 1956 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从而使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能够同时基本上完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的历史发展所准备好了的。1949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接着，我们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挑战，破除了我国一部分人的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肃清反革命运动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些运动的胜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时间内，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些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进行的，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不能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由此可知，对于五大运动无论就其

成績來說，也無論就其進行的形式來說，都是不應該懷疑的。五大運動的勝利保證了三大改造能夠順利地進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的。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互助組到低級合作社再到高級合作社的發展過程。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供銷小組、分散生產聯合經營等低級形式到手工業合作社的高級形式、從小規模的手工業合作社到規模較大的手工業合作社的發展過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到部分的公私合營再到全行業的公私合營的發展過程。同時，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聯繫配合起來進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相互關係，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萬萬人民生活的歷史大變革后的第一年，工農業生產不僅能夠正常進行而且能夠獲得很大發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群眾性運動中，在具体工作上是發生過一些偏差和錯誤的。政府對於這些偏差和錯誤，有的已經作了檢查和處理，有的正在檢查。我們歡迎全國人民繼續提出批評和建議。當然，我們在檢查偏差和錯誤的時候，要分析主觀的和客觀的原因，要分析在當時那些偏差和錯誤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無法避免的。這樣，我們才能判明這些偏差和錯誤的性質、程度和範圍。對於那些在當時條件下確實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錯誤，我們必須引以為戒，堅決糾正；對於在運動中受到不應有的損害的人，我們應該公開向他們道歉；在運動中沒有處理完畢的問題，現在應該由有關機關迅速予以處理。

但是，历次运动中發生的偏差和錯誤，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績的。以思想改造运动來說，由于这个运动也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某些問題的处理是比較粗糙的，因而損伤了一些从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帮助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数基本上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在这次整風运动中，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数都表示贊成社会主义，就是証明。再以肃清反革命运动來說，在政府历年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計有以下四类：（一）因积恶累累民憤極大而判处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点八，其中絕大多数是从解放后到1952年判处的，这在当时是絕對必要的；（二）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其中已經刑滿釋放或者安置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現在在押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三）实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經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現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点一；（四）逮捕后寬大处理、教育釋放的占百分之八点九。由此可知，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是經過劳动改造或者寬大处理而得到釋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們已經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其余仍在劳动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們認罪守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也将会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政府的初步檢查，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偏差的是極少数，而絕大多数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認為肃反的偏差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完全沒有根据的。毛澤东主席已經提出还要对这一运动进行一次檢查，我們相信，檢查的結果会繼續証明这一点。

过去进行的五大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組成部分。因此，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錯誤来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即使在个别单位甚至个别地区發生的錯誤比較严重，也依然不能否定这些运动的成果。党和政府每当提倡一种运动的时候，都是根据客观的迫切需要，经过慎重研究和典型試驗才提出的，而每次运动又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并且得到他們的拥护。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个别的。有人認為，如果我們說这些运动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个别的，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实际上，这些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号，就是为了夸大錯誤、抹煞成績，引导一些立場不稳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这些个别性質或者部分性質的偏差和錯誤，看成是这些运动的根本性質或者全面性質的錯誤，以达到他們动摇革命运动成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我們說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胜利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众階級斗争基本上結束了，但是这并不是說，階級斗争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着重地提出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說，現在就沒有敌我矛盾了。應該指出，目前在國內还有階級存在，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虽然已經早被消灭，但是这些階級的分子，还正在劳动中、生活中改造着，而他們固有的階級思想和階級感情，还不可能完全改变。私营工商業者的絕大部分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是由于他們还拿定息，对工人階級还有剝削关系，因而資產階級的两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張或者贊成把股息延长到二十年，有

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說股息不是剝削，仅仅是“不勞而獲”，說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分子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別，甚至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危險的敵人”。這些謬論都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剝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打掩護。有少數資本家主張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營企業，更是拒絕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種露骨的表現。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資產階級還存在着兩面性嗎？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說明資產階級分子還有繼續改造的必要嗎？對資產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他們進行自我批判，逐步改變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們得到“脫胎換骨”的本質改造。要作到這一點，又非經長期的改造功夫不可。這對絕大多數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業者來說，又有什么不好呢？現在不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工商業者認識到了這一點嗎？由上述情形看來，在人民內部矛盾中，目前還存在着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對抗的一面，還存在着嚴重的階級鬥爭，更不必說在人民內部之外，還存在着我們同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國外的帝國主義的敵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經明白看到的，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有思想鬥爭，也有政治鬥爭。因此，當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絕不能無視還有階級鬥爭的存在，也不能無視還有敵我矛盾的存在。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繼續進行和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還是我們今後的一項重要任務。

二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在我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中，我們已經正确地规划了建設和改造相結合的步驟。而 1956 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有了一个躍进的發展，經济事業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計劃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了前三年增长的总和。

现在我举出一些数字說明这个情况。

我国的工業总产值(不包括手工業产值，下同)，在五年計劃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而 1956 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正是由于这种迅速的發展，1956 年的工業总产值达到了五百八十六亿元，超过了五年計劃所要求的 1957 年的指标。从主要工業产品看，鋼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吨，而 1956 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金屬切削机床的制造，前三年由于調整設備和改变型号的原因，虽然在台数上比 1952 年沒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在新的品种增加和質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到 1956 年，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又比 1955 年增加了一万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电力、煤炭、石油、化学肥料、水泥等重工業产品，1956 年的产量比前三年的年产量都有較多的增加。噴气式飞机、載重汽車、大型發電設備和单軸自动車床等重要新产品也都是在这一年制造成功的。輕工業生产由于 1955 年农業丰收的有利条件，增长速度很快。例如，棉紗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万件，而 1956 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万件；棉布的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万匹，而 1956 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万匹；食糖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万吨，而 1956 年就增加了

将近十一万吨。

1956年,我国的农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如前所说,总产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超过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亿八千万的水平。1956年,在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农业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前三年共开垦荒地三千六百万亩,而1956年就开垦荒地二千九百万亩;前三年扩大的灌溉面积共四千一百多万亩,而1956年就扩大了一亿多亩。

1956年全国完成了将近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等于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因而改变了前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只完成五年计划一半稍多的情况,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十六,这就保证了第一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能够超额完成。1956年新增加的钢的生产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万吨;新建和修复的铁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产和建设的迅速发展相适应,1956年在运输方面和贸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全国现代运输工具前三年的货运量共增加了一亿一千二百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万吨;商业机构零售总额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亿元,而1956年就增加了六十二亿元。

1956年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显然,1956年的建设成就是极其巨大的。这就使国家有比较充足的力量来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从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阵地,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又保证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有可能比

較順利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從而準備了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有利條件。

1956年政府對國家建設工作的安排，總的說來是正確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點和錯誤。這些缺點和錯誤，將要在李先念、薄一波兩位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分別作的關於國家預算的報告和關於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中詳細指出。1956年預算開支中的某些項目和國民經濟計劃中的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從財政方面說，執行國家預算的結果，當年支出超過當年收入十八億三千萬元，動用了歷年財政結餘十六億五千萬萬元，並且從銀行透支了一億八千萬萬元，銀行發行貨幣也多了一些，因而動用了庫存物資大約二十億元。從經濟和文教方面說，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同時，職工的人數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學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職工的工資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雖然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這兩種物資的供應都較緊張，並且減少了國家的物資後備力量。在造成物資供應緊張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設投資額大了一些，“攤子”鋪得多了一些，這樣就多增加了財政的開支，多增加了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也就多增加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消耗。

對於1956年的基本建設工作，我們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由於許多建設項目在前三年已經完成了土木建築工程，需要在1956年進行大量的設備安裝工程，另有許多項目已經完成了設計和施工準備工作，需要在1956年開始大量施工，並且還由於設計和施工力量的壯大，設備自給能力的增長，需

要在 1956 年安排一些新的項目，这样，就使基本建設的項目大大地增加了。現在从建設項目来看，大多数是安排得恰当的，有小部分动工过早了，或者进度过快了，也有个别項目，是安排得不恰当的。不恰当的項目，显然是錯誤的。那些动工过早和进度过快的項目，在当年确实造成一些損失，但是，对于长远的建設事業还是需要的。同时，有一些項目，主要是一些非生产性的項目，由于建筑标准过高，造成不少浪費。这些，都应该引为教訓，今后力求避免。

由于基本建設投資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資供应緊張的情况，我們在 1956 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經开始察覺，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应緊張情况的繼續發展。以后在編制 1957 年的国民經濟計劃草案和国家預算草案的时候，我們就吸取这个教訓，縮減了一部分基本建設投資，适当地增加了国家的后备。

这次提交大会審議的 1957 年度的国家預算草案和發展国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各种数字表明，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是以既積極又充分可靠的步驟向前發展的。1957 年的国家預算收入比 1956 年增长近百分之二；为了避免像去年那样在財政上出現赤字的現象，国家預算支出比 1956 年减少百分之四。1957 年的工業总产值比 1956 年将增长百分之四點五，达到六百零三亿元，这是按照計劃範圍內 1956 年工業总产值五百七十七亿二千万元为基数进行比較的。农業总产值比 1956 年将增长百分之四點九，达到六百一十一亿元。基本建設投資縮減为一百一十一亿元，它虽然比 1956 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計劃原定的 1957 年投資还多十四亿元，五年

合計，仍然超过五年計劃原定数約五十億元。在 1957 年已經过去的五个多月時間內，預算和計劃的執行情况，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厉行增产節約，貫徹執行勤儉建国方針，爭取農業丰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災害，那么我們就能够順利地完成 1957 年的各項指标，也就能够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从而奠定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初步基础。关于我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議，国务院接受了这个建議，并且正在由有关部門具体制訂中。

應該指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劃建設中所已經取得和将要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援助分不开的。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苏联帮助設計和供应設備的共有一百五十六个建設項目，苏联給我国提供了大量的长期的优惠貸款，并且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专家幫助我們进行各項建設工作。这种真誠的援助，值得我們再一次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謝。現在还有人企圖抹煞苏联对我国真誠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苏友誼，破坏国际團結，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計。

有人認為，我国的發展国民經济計劃在 1956 年全面冒进了，在 1957 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見是不正确的。我国 1956 年的計劃，是在改造和建設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積極性，他們紛紛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額。1955 年農業

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經济的發展准备了物質条件。同时，基本建設發展到了五年計劃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規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說明我們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設的速度。1956年的計劃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躍进的步驟，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說的巨大成就。不錯，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屬於局部性質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來說，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質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說1956年的建設是全面冒进。1957年，由于去年农業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財政和物資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設的步驟，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地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們應該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綫發展的。随着客觀条件的变化，發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發展也是这样。尤其是像我們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業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發生，要求国民經济年年都毫無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發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人認為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搞坏了，这是完全錯誤的。無論从工業生产、农業生产、基本建設、文化教育或者財政收支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以1957年的計劃数字同1952年的实际数字作比較，我国的工業总产值增长一点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亿元。以鋼的产量來說，第一个五年合計将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略时候的东北在內，从1900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計的鋼产量不过七百六十万吨。当然，